

中外经济专家论坛

中国的开放经济

▶ 大卫·沃尔 著
(David Wall)

姜建强 等 译
张 军 校订

ZHONGGUO DE KAIFANG JINGJI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的开放经济

▶ 大卫·沃尔 著
(David Wall)

姜建强 等 译
张 军 校订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开放经济/[美]沃尔(Wall, D.)著;姜建强等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4

(中外经济专家论坛)

ISBN 7-81049-735-9/F·627

I. 中… II. ①沃… ②姜… III. ①开放经济-经济政策-研究-中国 ②市场经济-研究-中国 IV. F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688 号

□ 责任编辑 王联合

□ 封面设计 周卫民

ZHONGGUO DE KAIFANG JINGJI

中国的开放经济

大卫·沃尔(David Wall)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件: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上海浦江装订厂装订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90mm×1240mm 1/32 14.375 印张(插页:2) 298 千字

印数:0 001—3 000 定价:35.00 元

献 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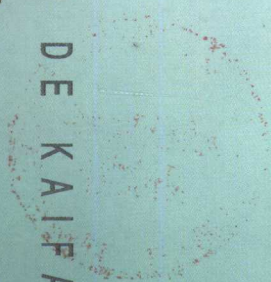
我所有的中国朋友们，没有他们的
诸多帮助，我难以有今天的成就。

大卫·沃尔 英国经济学家。1940年出生。伦敦经济学院毕业。长期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策的研究。过去20年转入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和评论。从1987年9月起参加多个有关中国经济特区问题的研究项目。1987~1993年期间，承担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重要研究项目。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聘为皇家国际事务所中国问题高级顾问。1997~1998年，负责Chatham House的亚洲研究项目工作。1998~1999年，全职担任中英论坛首任总秘书长。曾长期在英国SUSSEX大学执教。后任伦敦大学SOAS学院和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现为英国剑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已发表诸多论著，涉及发展战略和政策评论等领域。



中外经济专家论坛

ZHONGGUO DE KAIFANG JINGJI



目 录

前言/1

1. 开放经济的改革:1979~1992/1

1—1 背景/1

1—2 改革与开放/3

1—3 外贸与外汇领域/5

1—4 外商投资领域/23

1—5 经济特区/34

附录:中国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法律体系的发展/48

2. 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角色/50

2—1 引言/50

2—2 经济区的经济逻辑/55

2—3 政策激励/57

2—4 市场体制的实验/60

2—5 结论/67



3. 出口加工区的性质、机制、作用及其对中国的特别含义/70
 - 3-1 引言/70
 - 3-2 出口加工区的性质/71
 - 3-3 出口加工区的机制/78
 - 3-4 出口加工区的角色:以中国为例的分析/83
 - 3-5 结论/89
4. 中国经济特区:行政和法规模式/94
 - 4-1 引言/94
 - 4-2 经济区域的政治经济背景/95
 - 4-3 经济特区政策目标的具体说明/98
 - 4-4 管理结构/102
 - 4-5 法制建设的必要性/106
 - 4-6 结论/130
5. 中国的经济特区政策:一个评价/134
 - 5-1 引言/134
 - 5-2 改革尝试/137
 - 5-3 改革的成就/158
 - 5-4 相关数据分析/162
 - 5-5 结论和政策建议/170
6. 中国的经济区:分类学研究/175
 - 6-1 各种经济区/175
 - 6-2 经济区内的经济区/180
 - 6-3 一揽子政策/181

6—4 结论/183

7. 中国的资本流出/185

7—1 引言/185

7—2 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194

7—3 中国对外非贸易性投资的地缘分布与部门分布/207

7—4 案例研究: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226

7—5 结论/239

附录一:关于统计的几点说明/244

附录二:非法的资本外流/247

8. 中国的海外投资/254

8—1 引言/254

8—2 总体数据/262

8—3 微观数据: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265

8—4 结论/267

9. 技术进步与出口业绩:关于中国技术发展模式的讨论/271

9—1 引言/271

9—2 技术革新进程回顾/274

9—3 高科技发展计划的实施情况/277

9—4 出口业绩/280

9—5 高科技计划国际化的效果/289

9—6 结论/295

附录一:深圳经济特区对高科技企业的优惠政

策/297

附录二:上海浦东新区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300

10. 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非国有企业的出现/304

10-1 引言/304

10-2 中国改革的速度/305

10-3 超越国有部门:中国工业中的非国有部门/310

11. 中国的货币市场/317

11-1 引言/317

11-2 初始阶段/318

11-3 债券形式/321

11-4 发行市场/326

11-5 二级市场/329

11-6 债券市场与宏观管理/331

11-7 结论/336

12. 中国的期货市场/338

12-1 引言/338

12-2 远期与期货的定义/340

12-3 远期与期货交易的作用/344

12-4 效率评价标准/348

12-5 中国的期货与远期市场/352

12-6 中国期货市场的效率与实效性/363

12-7 结论/385



13. 中国是市场经济吗/389

13—1 引言/389

13—2 什么是市场经济/392

13—3 价格形成/396

13—4 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特征/405

13—5 结论/428

后记/432

开放经济的改革：1979~1992

1-1 背景

自从 1976 年之后，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邓小平复出，一种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政治气候也就随之开始形成。然而，只是到了 1978 年末邓小平才赢得政治斗争的胜利。

1978 年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各种讲话都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需要鼓励外国投资和引进国外技术。同一年，中国宣布了在国内和西方国家进行科学技术人员和工程人员培训的重大计划。1978 年 12 月召开



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改革的主张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次会议宣布: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劳动生产力极大地增长,这也就要求同劳动生产力增长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发生变化,同时要求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的管理方法、行为和思想。因此,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一场深刻和广泛的革命(China Quarterly, 1979, as quoted in Spence, 1990)。

尽管“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第一次是由周恩来在1964年使用的,但是,到了1978年后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思想及其政治含义则完全不同。的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经济政策思想的一次重大变化,对于中国人民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意义。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共中央要求放松党对经济的控制权,赋予地方政府以更大的自主权,让经济单位包括工厂和农场承担管理责任。中共中央提出让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农村建立自由市场(乡村集市贸易)。中共中央也认识到建立法律体系和独立的司法机构对于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性。中共中央相信在四项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的指导和范围内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China Quarterly, 1979, as quoted in Spence, 1990, P. 658)。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在召开之际,可口可乐公司就已经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即在上海开办一家瓶装工厂并在中国销售产品,这一消息的宣布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

根据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改革的两个最重要的

目的是,对中央计划经济实行分权和彻底改变同国际经济隔离的政策。然而,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向以市场力量为主的经济转换过程中,所有的政策变化都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

对外实行经济开放的结果,取决于同外界关联的决策者受到国内政策变化影响的程度。他们利用国际机会的能力,随着他们在国内经济中行动自由受到束缚的程度减少而增强。如果国内政策改革把经济利益同商业活动联系起来,他们利用国际机会的意愿也将得到加强。这两点在1978年的改革中都做到了。分权使得更多的个人和企业能够对国际市场信号作出反应,国内要素和商品市场的开放也提高了个人和企业对国际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的能力。而向经济激励结构转变也就意味着,个人和企业从事国际经济活动是有吸引力的商业活动。

1-2 改革与开放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改革与开放”。“改革”是指采取分权的政策变革和更多地依赖市场的政策变化;“开放”则是指以加大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为目标的政策变革。这项研究涉及的是“开放”的过程,亦即使中国经济受到外界影响的商业政策框架。然而,没有对改革的理解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开放的影响,改革的实施涉及整个经济的其他所有方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看成是在政治上通过

了授权立法,它使得实施市场化的经济政策措施成为可能。自从1978年以后^①,中国已经有许多详细的经济政策改革,它们可以分成主要的三大类:其一是有关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济管理体制,其二是有关决策的分权,其三是有关价格改革和市场的建立。

所有制和管理的改革包括建立农村有限的土地所有制、建立私有部门(Wang,1992)、鼓励合作部门和鼓励国有工业合并成为企业集团。在承包责任制下,改革后的企业和未改革的企业在资源的使用上都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尤其是由税收体制取代利润完全上交中央的体制。

分权的重要性在于,省市政府与中央政府部门和机构所有的生产单位不再受计划过程的严格限制,并且生产单位有某些权力决定生产什么和向何处销售。

在价格改革方面,许多价格控制已经被取消。然而,对于许多产品来说,放松控制还只是局部的:它们受到定价双轨制的制约,即一个受到控制的价格(这是残留下来的计划经济所要求的)和一个由市场确定的价格。放开或部分放开价格加上分权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导致市场的建立,包括消费品、生产品和生产要素产品的批发和零售市场。这些市场已经部分或全部取代了国家分配体系,或者直接同国家分配系统相竞争。

国内的改革和政治约束的放宽,对于决定开放过程的结果是特别重要的。中共中央认为,对于保证四个现代化的成功实现,开放是必要的。中国企业成功

^① 关于最近的政策发展,参见世界银行的报告(1989,1990,1992)等。

和有效地进行贸易,外国企业对中国成功地进行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在同样的程度上既取决于国内经济政策的改革,也取决于商业政策、外汇政策和外商投资政策的变化。

如上所述,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本身并没有着手改革,它本质上是一项“授权法案”,为各部门向国务院提供立法建议及实施改革开了绿灯。为实施改革制定原则和规章制度的有关法律和行政命令是后来出现的。不过,改革的过程常常是这样的,即法律和行政命令跟随在改革之后,而不是事先制定出来的。

后来,为支持“改革”和“开放”过程所必需的法律纲要写进了1978年末发表的十年发展计划中。这一计划为贸易和外商投资的增长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为了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有关法律和行政命令早在1979年就开始大量出现。从此之后,当碰到值得注意的问题和情况发生变化时,这一过程就不断地继续下来。要把握不断出现的法规和行政命令是困难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完全得到有效地解决,并且某些目标的实现也作了让步。接下来,我们将考察“开放”过程的政策发展并估计三个领域内这些发展的“质量”,亦即外贸与外汇领域、外商投资领域和经济特区。

1-3 外贸与外汇领域

1-3-1 起点

中国经济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

在 1978 年开始经济改革之前,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5%,进口额则占 4.7%,而美国这一比例则分别为 6.5%和 8.5%。到 1991 年经济的开放使得中国的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上升到 19.6%,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上升为 18.6%,大大地超过美国分别为 7.4%和 8.9%的水平^①。然而,尽管外贸已经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还是不能被看成是外向型经济,不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现在都是如此。最初,改革的中心焦点集中在内部发展上,市场力量在决定贸易水平和结构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

在改革之前,贸易只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简单的平衡项目。计划过程确认国内经济短缺的基本物品并决定哪些短缺应该由进口来弥补。当时,90%以上的进口品是生产物品。出口是为支付进口而进行创汇,它们被明确地写进了某些部门的生产计划中,并且国内的消费计划不包括这些生产计划的产量。当时,一半以上的出口品是初级产品。

计划下所有贸易的管理都掌握在同生产部门有关的对外贸易公司手中。对外贸易公司的数量一直很少,而且不断变化。到 1978 年,对外贸易公司的数量为 12 家,它们控制着中国所有的进口和出口。中国并没有出口效率检验,以确保出口同中国的比较优势相

^① 用美元或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结果,向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的国际比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关中国国民收支和贸易统计,参见 Lardy (1992)。